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赋税论

[英] 威廉·配第 / 著 邱霞 原磊 / 译



*A Treatise of Taxes
&
Contributions*

华夏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赋税论

[英] 威廉·配第 / 著 邱霞 原磊 / 译


*A Treatise of Taxes
&
Contributions*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赋税论/(英)配第(Petty, W.)著;邱霞,原磊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5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ISBN 7-5080-3990-4

I. 赋… II. ①配… ②邱… ③原… III. 税收理论
IV. F8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754 号

赋税论

(英)威廉·配第 著
邱霞 原磊 译

策 划: 于洋俊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5月北京第1版
200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1

字 数: 100千字

据 页: 2

定 价: 2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188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H. 福西特（1833～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建国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来有，呈现出

2 赋税论

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 and 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新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

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赋税论

本文结合爱尔兰的现状及社会问题主要阐述下述几个重要税收类型（或者作用相当于税收的措施）的性质和职能：

王领地税	垄断
估价税	官职
关税	什一税
人头税	铸币的增值和贬值
彩票	炉税
捐献	国内消费税
刑罚	

同时也在行文中穿插了下述几个与税收相关的概念：

战争	保险
教会	货币出口
大学	羊毛出口
租金和土地价格	自由港
利息和汇费	铸币
银行和信贷业者	房屋
转让财产登记	信仰自由
乞丐	

1899 年重印版说明

《赋税论》（全称《关于税收和捐献的论文》，英文全称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译者注）是威廉·配第最早的经济学著作。由于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回顾其近期著作的时候，提到了1662年1月出版的格兰恩特的《根据死亡率表作出的对自然和政治的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一书，并且我们知道威廉·配第在1662年10月以前一直居住在爱尔兰^①，因此我们推测《赋税论》其写作应当是在1662年前期完成的。当时的威廉·配第刚刚从他的政治野心中解脱出来，推着极大的热情重新投身到对科学的追求中。^② 基于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双层底子，这一时期他写作了著作《赋税论》；

① 根据是威廉·配第写给罗伯特·默瑞（Robert Moray）爵士的信，见《英国皇家学会书信手稿集》，第1页和第2页。——1899年版注

② 参阅：威廉·配第后代菲茨莫里斯（Fitzmaurice）所著的《配第传》，第104～107页。——1899年版注

2 赋税论

同时，他还做了几个演讲：关于制衣的问题，关于如何对待垂死的皇家学会历史的问题以及关于海运的问题^①。

《赋税论》其确切出版日期无从考订。如果我们承认《赋税论》中“最受它的国民拥戴的国会”这句话，意指1662年3月4日爱尔兰众议院投票决定将3万英镑作为礼物馈送给奥尔蒙德（Ormond's）国会^②这件事情，并且认为威廉·配第是从4月19日白厅^③的来信中得到这一消息的，那么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怀特·肯奈特的推断^④：《赋税论》是在1662年的5月写成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引用配第自己的话，《赋税论》恰好是在奥尔蒙德公爵行将前往爱尔兰任总督之际诞生的，那么《赋税论》就应当是在1662年7月正式出版的。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后来可能由于国王举行婚礼的缘故，奥尔蒙德公爵将启税的时间从原来的5月份推迟到了7月份^⑤。如果把这两种推断进行融合

① 参阅：伯奇著《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Birch, History of the Royal Society），第一卷，第65页；《配第书目集》（Bibliography），第7页和第28页。——1899年版注

② 参阅：《政治体制解剖》（Political Anatomize），第9章。——1899年版注

③ 白厅即是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④ 参阅：肯奈特，《编年史记》（Kennett, Register and Chronicle），第703页。——1899年版注

⑤ 参阅：卡特，《奥尔蒙德公爵》（Carte, Ormond），第二卷，第257页。——1899年版注

再加以思考，我们认为配第在写下序言的时候，以为奥尔蒙德公爵将马上启程去爱尔兰，但却没有料到后来行程的延期。因此，我们推断，《赋税论》是在1662年5月出版的。

迄今四个版本的《赋税论》都是在配第生前出版的。^①在这四个版本中，第一版（1662年版）有可能是配第亲自主持出版的。第二版（1667年版）是当配第在爱尔兰的时候，由伦敦方面印刷出版的。而第三版（1679年版）的出版似乎并非出于配第的本意。1678年5月29日，配第给奥布里（Aubrey）^②写了一封信，信中谈道：“关于重印《赋税论》一事，我不想参与。我从来不敢奢求能够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也不认为自己应当被载入史册。”^③10月5日，配第在写给罗伯特·索斯韦尔（Robert Southwell）爵士的信中，再次表达了不愿重印《赋税论》的想法。^④第四版（1685年版）仅仅是将1679年的版本换了一个封面，然后就重新出版

① 参阅：《配第书目集》，第六卷。——1899年版注

② 约翰·奥布里（J. Aubrey, 1626~1697），英国古董收藏家及作家，其作品《短暂的生命》在其逝世后发表，其中包括对其著名的朋友的性格刻画，如托马斯·霍布斯、约翰·密尔顿及弗朗西斯·培根等。——译者注

③ 参阅：菲茨莫里斯的《配第传》，第258页。原信件保存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奥布里手稿》，第二卷，第110页。配第的后代贵族菲茨莫里斯捐献给大英博物馆的是这封信的附件。——1899年版注

④ 参阅：索普书目图书馆藏《索斯韦尔手稿》（MSS. Bibl. Southwelliance），1834年版，第403页。——1899年版注

4 赋税论

了，因此没有独立的版权。我们目前是对第一版的重印，^①这一版本被认为是这四个版本中最可靠的版本，虽然我们没有找到这一版本的手稿，但是从该版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确定，这一版本的出版是经过作者本人授权的。当初的版本是匿名发行的，关于这部著作的原创作者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配第第一次公开承认是这部著作的原创作者，是在查尔德（Child）出版发行的专门讨论有关贸易和货币利息问题的刊物的一期增刊上，1668年，伦敦，伊丽莎白·卡尔弗特（Elizabeth Calvert）著。^②

① 1662年版的印刷很粗劣，存在有非常明显的拼写错误，如把“encrease”误作“enrease”（英文原版第24页），把“statesman”误作“statseman”（英文原版第41页），把“beer”误作“beeer”（英文原版第74页），这些错误在本版中都已得到了改正。除此种情况之外，本次印刷完全终于原版。——1899年版注

② 后来再版在查尔德的《贸易新论》（*New Discourse of the Trade*）一书中，1693年版，第26页。——1899年版注

前 言

1. 对那些不现实的年轻人来讲，虽然他们结婚的根本和惟一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儿育女，更不是为了生育适合某一特定职业的女儿，但是一旦有了孩子，他们还是会尽力按照孩子的兴趣和意愿教育和培养他们的。对我来讲也是如此，虽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我脑海里的一些令我烦躁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供他人参考，或者解决什么实际问题，但是既然这本书已经完成，并且它的问世恰逢奥尔蒙德公爵^①即将出任爱尔兰总督之际，因此我希望它对子分析爱尔兰或者其他地方事务，会有可借鉴之处，虽然这种可供借鉴的意义也许并不大。

要想统治爱尔兰，就必须要保持大批的军队，以防爱尔兰人将来叛乱，这种叛乱既有害于爱尔兰自己，也有害于整个英格兰。为了维持这样大批的军队，就必须要向那里贫困的国民和荒凉的国土大量征税。因此，让爱尔兰人了解一下各种税收的内容和征税的标准还是有必要的。

^① 奥尔蒙德公爵 (Duck of Ormond)，本名詹姆斯·巴特勒 (James Butler, 1618 - 1688)，出身爱尔兰贵族，保皇党成员，曾先后三次出任爱尔兰总督。——译者注

2 赋税论

2. 对爱尔兰来讲,通过对教区进行合并再重新加以划分,^①使那里成为适合传播福音的地方,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项工作正好可以依据马上就要制作完成的新的爱尔兰地图^②

① 1662年爱尔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将各个教区合并进行重新划分的法令。参阅查理二世14年和15年的第10号法令。我们不清楚配第和这项法令的颁布有没有关系,但是这项法令看起来似乎反映了配第的观点:“在这个王国有些地方,教区的划分过于狭小,1英里或者2英里的范围内就有五六个教区,这就使得教徒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不必要的建筑和维修多个教堂的费用,而教堂的费用本来就少得可怜,有时候甚至连一个牧师的费用都负担不起;而有些地方的教区划分得又过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该教区的教徒从家里去一趟教堂都很难一日往返;还有就是教区的划分也不合理,比如某个教区的教徒去别的教区的教堂反倒比去他自己所在教区的教堂更方便。”因此,从1662年的米迦勒节(Michaelmas)开始,在各相关方面一致同意的前提下,爱尔兰总督下令将各个教区合并进行重新划分。——1899年版注

② 大概是指配第以山区测量原图为基础刻制的爱尔兰地图。在这个地图中,标明了各郊区的边界。参阅:拉克姆编《配第在山区测量方面的贡献》(Petty's *Hist. of the Down Survey*, ed. by Larcom),第49页。1665年,配第请求国王“协助编制爱尔兰地图”,后来这一请求获得了批准。同上书,第400-401页,第323页。但是配第在编制爱尔兰地图的过程中,似乎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因此在1672年,配第宣称他自费制成了各区、各村以及各部的详细地图,并把它们雕刻成铜版,并通过这种方法制成了各州以及整个王国的地图。参阅:《爱尔兰的政治体制解剖》(*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第9章。随后,各村地图以《爱尔兰概况》(*Hiberniae Delineatio*)为名称获得了出版,但出版日期不详。参阅:《配第书目集》(*Bibliography*)。这本出版日期不详的地图在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都有收藏。都柏林(Dublin)的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图书馆也收藏了3本。这几本地图中,除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那本以外,每本都包含一张配第的肖像图,这一肖像图是由爱德文·桑迪丝(Edwin Sandys)刻版的,日期为1683年。英国博物馆在编排印刷地图目录的时候,把它的出版时期推测为1685年。但是这本地图的扉页“爱尔兰总图”[由萨顿·尼古拉斯(Sutton Nicholls)刻版]则附有考克斯(Cox)所著的《爱尔兰的历史》(*History of Ireland*)这本书的广告,而《爱尔兰的历史》第一卷是在1689年出版发行的。爱尔兰国立博物馆的收藏本是为了献给配第的后代亨利(Henry),即谢尔本伯爵(Earl of Shelburne)的再版本。因此这一版本只可能是1719年(谢尔本被授予伯爵爵位)之后,1751年(谢尔本逝世)之前出版的。——1899年版注

来做。另外，我曾经谈到的关于牧师的很多问题，在爱尔兰也是存在的。

3. 爱尔兰地区资源丰富，因此如果不采取措施增加出口，反而会对该地区不利，而出口的增加有赖于关税和消费税的征收尺度的明确。

4. 由于从总体上讲，爱尔兰的人口是不足的，并且在将英格兰人迁往爱尔兰，或者将爱尔兰人迁出爱尔兰之前，^① 当地政府必须要花费大量的经费来供养军队，才能维护当地安全，所以我认为要吸引英格兰人迁往爱尔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知道，从全国范围来看，国王的收入占全国的财富、租会及个人所得的十分之一以上；而在爱尔兰，公共费用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减少到英格兰地区的什一税水平；并且随着国王收入的增加，国王的支出全相对地减少，这是一种双重利益。

5. ^② 雇用英格兰的乞丐修理公路、疏浚运河，将会有利于爱尔兰的羊毛和家畜的出口。

6. 对爱尔兰来讲，充分理解货币的性质、不同铸币

① 通过将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同化的方法解决爱尔兰问题，是配第自 1665 年以来持有的得意见解。据说，同文森·古金（Vincent Gookin）一样，配第坚决反对将爱尔兰人迁移到康诺特（Connaught）的种族隔离政策，而且一直到他去世都坚持这种观点。参阅：菲茨莫里斯的《配第传》（E. Fitzmaurice, *The Life of Sir William Petty*），第 31 页，第 32 页；配第的《论爱尔兰》（William Petty, *Treatise of Ireland*）。——1899 年版注

② 原文为第“6”条，没有第“5”条，这里加以调整，以下逐条按次顺延。——译者注

4 赋税论

的不同经济效果、提高货币价值和降低货币价值的不同的经济效果以及货币价值的不稳定性，才是一门最实际的学问；正因为缺少这门学问，爱尔兰最近才会经常发生货币发行混乱的情况^①。

7. 在爱尔兰，一片土地的价值仅仅相当于其6~7年的地租，然而在海洋彼岸的英格兰，一片土地的价值却要相当于其20年的地租。在没有想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以前，让爱尔兰人知道价格存在差异的原因还是有好处的。

最后，我想如果有人能够对爱尔兰的问题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和意见的话，在奥尔蒙德公爵担任行政长官的时候向政府提出来会是一个最佳的时机，这是因为：

(1) 奥尔蒙德公爵对爱尔兰的情况了如指掌，无论是和平时期的爱尔兰还是战争时期的爱尔兰。他不仅了

^① 在共和政府期间，私人滥发铸币的情况非常严重。在配第来到爱尔兰之前不久，就有几个伦敦人因为将伪造的或者贬值的英格兰货币和秘鲁币走私到爱尔兰而被执行死刑。参阅：西蒙的《论爱尔兰货币》(Simon, *Essay on the Irish Coins*)，第48~49页。虽然会被处以严厉的刑罚，但是这种货币走私行为并没有得到制止。同上书，第49~52页，第118~122页。1660年1月29号，共和政府发布了一个通告，明确规定了金银铸币的固定比率。同上书，第123~124页。1661年8月17日，共和政府又发布了一个通告，禁止私人铸造货币。参阅：鲁丁的《英国及其附属国的铸币史》(*Annals of the Coinage of Great Britain and its Dependencies*)，第二卷，第4页；弗利特伍德(Cf. Fleetwood) 1653年2月16日写给瑟楼(Thurloe)的书信；《国情报告》(*State Papers*)第二卷，第94页。——1899年版注

解爱尔兰国内某些特殊人物和一切党派的利益关系，他还了解英格兰以及那些和爱尔兰有关系的国家的情况。

(2) 奥尔蒙德公爵已经用他的智慧鲜活地证明了他关心英格兰在爱尔兰的利益的，并且他也能够做到尽可能地去解决那里的种种问题。

(3) 奥尔蒙德公爵在爱尔兰所占有的土地之多是爱尔兰历任总督之最，因此他不会面对坎普登曾经提到的那种危险。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坎普登（1551～1623）曾经向其他爱尔兰总督提出过这样的警告：爱尔兰人是有怨言的。奥尔蒙德公爵之所以不会遇到被爱尔兰人埋怨的危险，是因为一个已经获得了最多土地的人没有理由会去想获得再多的土地了。

(4) 当某些只是为了搜刮民财而入主爱尔兰的总督不顾爱尔兰国民的疾苦和怨言一达到目的立马就一走了之的时候，奥尔蒙德公爵却向爱尔兰国民保证要实施仁政，并且预先扫除了一切施行仁政的障碍。

(5) 奥尔蒙德公爵敢于去做任何他认为是恰当的事，他可以为了某一个公民获得公平的待遇而力排众议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被心怀嫉妒和不满情绪的人所曲解也不在乎。奥尔蒙德公爵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在于他举世闻名的宽宏大度使得国民不会反对他；第二个在于他对陛下久经考验的忠诚会使得传到陛下耳中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6 赋税论

(6) 奥尔蒙德公爵对于一切提出创造性建议的努力都给予大力支持，并且重视这些精辟的建议，在慎重选择之后能够大胆采用和大力实施，这使得英格兰东部的明智之士都愿意这随他前往爱尔兰。

我们伟大的奥尔蒙德公爵是在爱尔兰的发展还有如一张白纸的时候来到这里统治这片土地的，这时的爱尔兰议会向他表示了好感。这时候，爱尔兰议会是忠于国王并且乐于谨慎地进行改革的，他们非常愿意接受他的建议，遇事也会向他咨询意见。正因为如此，在奥尔蒙德公爵执政的期间制定的成文法和自然法的通过才是可能的。

因此，这时候把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用来分析爱尔兰的社会情况，我想我的老调重弹是对的，是趁热打铁，我认为至少应该在它们有用的时候把它们发表出来。在此我想要广而告如世界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能够改变世界的，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得到和平，让都一个人都各得其所，这样世界才会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我非常清楚“事物的发展是不应被人为破坏的”^①，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① 这是配第非常喜爱引用的一句话。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这句话，如在他所著的《论二重比》中（参阅：《政治算术》，献辞注，1674年），还有在他1686年6月2日写给索斯威尔（Southwell）的信中（见菲茨莫里斯的《配第传》，第274页）都引用过这句话。有人说配第是这句话的作者，也有人说这句话是当时社会上的一句流行语。——1899年版注